

中国人心理透视

上官子木 著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心理透视/上官子木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4.9

ISBN 7-80084-619-9

I. 中… II. 上… III. 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国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326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

电话: (发行部) 8425 4364 (总编室) 6422 8516

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084-619-9/C·15

定价: 22.00 元

自序

中国人的很多特点，尤其是弱点，尽管被人们评论得很多，甚至被贬斥得很低，但这些特点却像国粹一样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因为这些特点无论是优是劣都是每个中国人生活所必需的，即源自社会环境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属于国民劣根性的内容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去除国民劣根性的根本并不在于个体国民的精神改善，而是整个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的改善。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些特点或弱点是怎么形成的，是由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促成的，以及导致这些特点或弱点能够不以人们的喜好为转移而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因素。

每一个体面对所属社会文化的内容，都是在自身个性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摄取，而每个人所共同选择并同化的文化内容，则使隶属于该文化的人们具备了一种共性化的社会性格。国民性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超越个体差异的社会性格，并展现出相应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实际上，我们的国民性不是在冠冕堂皇的言教中获得的，而是在种种点滴细小的现实生活情景中被潜移默化地

促成的。本书力图通过对社会生活中具体现象的思考，最终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表现，以及从社会化的角度来展现每个普通人是如何在生长过程中，被周围的社会环境驯化成为具有中国人共同特点的社会人。

对于研究中国人来说，本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不是从理论概念上抽象笼统地评价中国人，而是站在普通人中间具体细致地观察中国人，并透过现代人的社会行为客观地剖析中国人的心理。因而本书所展现的，不是抽象的中国人，不是外在的中国人，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以及周围人的身影。书中所谈的“事”都是我们平时耳闻目睹的日常小事，所说的“人”也都是属于寻常百姓的普通人。

另外，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有利于我们从多重视角探讨国民性的形成与演化。由此，本书中含有不少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进行比较的内容。面对同一个事物，中国人的所思所行与其他国家的人有什么区别，这对于分析和评价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客观的参照，而跨文化比较也是一个极佳的思考基点。在跨文化比较中，我们不仅可以从国内生活之镜中观察和分析中国人，而且还可以从国外生活之镜中反观和透视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对照和反观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很容易清醒而明了地认识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优点、特点，也包括我们的缺点、弱点。

本书力图在展现中国人国民性的同时，探讨其形成的

过程，以及国民劣根性存在的社会因素乃至内在的合理性。与其他评论中国人的书所不同的是，对于国民劣根性，本书并不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斥责与批判上，而是希望以理性的分析引发出更深入的思考，同时致力于提高大众的民族自知程度。

上官子木
2004 年 6 月

比较的纵横差异

在北京的一些中小学里有不少外国人的子女就学，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外国学生的家长同中国教师在教育观及教育方式上常常出现很大的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辩。其中较突出的差异表现在，对学生的要求是使用单一标准统一要求，还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别而区别对待。

外国学生的家长常常特别不满中国教师用横向比较的方式要求所有学生都达到同一标准，并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他们向中国的教师表示，自己的孩子根本无须也没必要与别的孩子进行比较，只要与自己的过去比有进步就足矣了。

面对如何评价孩子，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

在西方，教师尽量避免对孩子进行横向比较式的评价，对学生往往是既不表扬也不批评，其理由是，批评了这个孩子会刺激他本人，表扬了这个孩子会刺激别的孩子。这种有关评价的观念与我们中国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尤其

是表扬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伤害其他孩子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很少具备的。

有位中国学者去美国访问时，某天在饭馆里吃饭，同桌共餐的众人中有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长得特别漂亮，以至于这位中国学者情不自禁地出语夸赞，不料，另一位长得难看的女孩的母亲对他的这一行为提出了郑重的批评，指出他当着两个孩子的面夸赞其中一个，实际上是伤害了另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这位母亲的话使他懂得了一个他以前从未留意过的道理，也使他为自己的虽无意却是不妥的行为深感惭愧。事后，这位中国学者还得知，这位母亲并不是孩子的生母而只是养母，从而更钦佩这位美国母亲尊重孩子人格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的学校里，批评和表扬是教师最经常运用的教育工具。与西方教师注意学生自身的纵向发展而避免对学生进行相互横向比较的作法正相反，中国的教师最喜欢采用横向比较法，即利用小红花、小红旗等方式鼓励孩子们竞赛，看谁表现得好。

在中国，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当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时常常是采取表扬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作榜样的方式。所以中国人从小就学会用外在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特别是通过与他人的横向比较来评价自己。

东西方人反映在比较评价上的纵横差异，其根本点还是在认识集体意志与个体差异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在中国的学校，主要是以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

为主，个体被要求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需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此，中国人强调群体意识而不是个体差异，甚至于不认为存在着个体差异，因而学校总是用统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中国的教师对表现欠佳的学生最常用的批评语就是：“别人都能做好，你为什么就做不好？”实际上，个体差异的存在是个不容否认的社会现实，中国学校的教师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否定态度其实质是否定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于是采取各种措施以期消除个体差异。

相比较，西方人不仅承认而且非常强调个体差异，教师们总是根据不同孩子的不同个性与能力安排不同的活动并作出不同的要求。西方的教育属于个人中心型，其特征就是重视个性、突出个人，西方的教师之所以有差别地对待学生，其目的是为了使得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具有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实行的是不考虑个体差异的平均主义教育，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群体成员。

中外不同的教育观和教育方式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中国人注重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不习惯于脱离群体，包括因出众而独立于群体。于是，与他人保持一致便成为规范自己行为的依据及动力。由此，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比较就是通过与大众化形象的比较来了解自己的位置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理想的现代教育应当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包括东西方教育观及教育方式的融合。我们当

然没有权利要求西方人吸收东方文化，但我们自己应当能够明智地意识到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益处。

仅就学校的教育方法而论，横向比较式的评价法的确有着明显的弊病，首先，无视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态度；其次，绝对化的横向比较使个体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不利于学会采取扬长避短的生存策略；第三，注重与他人比较必然会导致攀比心理定势的形成，这是造成众多心理失衡的根源。

爱攀比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正是因为从小被灌输横向比较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时时、处处、事事都要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而客观现实中不可避免的众多差异又诱发了人们诸多的心理不平衡。

其实，绝对的纵向比较是不存在的，在由人群的相互合作构成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作为客观现实已构成了自然比较，因而，对横向比较的强调必然是一种过度导向。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无力改变中国人的这种横向比较的思维习惯，但是，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可使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避免步入这方面的误区，从而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

事例与数据

认识了一位来华作学术访问的美国教授，在探讨学术问题时，我就注意到他不断地使用具体的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私下里闲聊时，发现他还是数据不离口。在谈到计算机已开始进入中国普通家庭时，他马上问占百分之多少；一提到中国这几年境内境外的旅游热，他又赶紧问，百分比是多少。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具体数据，可看他那没有数据支撑就一脸的困惑状，只好凭自我感觉信口估计了一个百分比，而他便信以为真，又一脸欢欣地交谈下去。我暗自好笑，老外对拍脑瓜拍出来的数据居然还挺当回事。

在观看美国大众化的电视谈话节目时，也发现统计数据无时不出现在社会问题的讨论及社会现象的描述中。显然，美国人偏爱数据并不限于知识分子。另外，美国人运用数据，不仅是在说明某种现象时以此作为事实凭据，而且在表述自己观点时以此作为论述依据。

咱们中国人对“数据”不感兴趣，热衷于的是“事例”。无论哪一刊物的编辑在约稿的时候，都忘不了嘱咐我

要有生活例子，千万别堆数据。“事例”其实就是特例，不管所述事例多么具有普遍性，作为单一的具体的事例则只能算作一种特殊情况。

只述一例，从逻辑上来看，应当说是不具代表性的，仅从一例就推出一系列结论，应当说是不科学的，西方人也正是如此认为的。相比较，中国人则偏爱事实，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一个生动的例子比一堆确凿的数据更能使中国人信服。

联想前不久，当各家报纸都报道了同一个事例：某来自农村的小保姆如何天资聪颖，学富五车并等价于资深的老专家时，纵使你心存疑惑也难免会因那充满细节的生动描写而相信人间奇迹无处不有，直到又有记者用更详细、更确凿的事实揭露那是一例假报道时，你才恍然发现自己几乎为假事实所骗。

比起连环画般的事例，数据缺乏直观性，自然也缺乏生动性，而数据所代表的意义还往往需要一定的想象与延伸，即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理解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不过，数据自有其特定的优点，即能表达出普遍性，并能从普遍性中推出相应的结论。如果说，因病退学的大学生中有62%是患有精神疾病，那么就可以推知，精神疾病是导致大学生病退的第一位病因；还可以推知，每三个因病退学的大学生中几乎有两个是精神疾病患者；进一步的推论则是，防治精神疾病可以降低大学生的因病退学率。

“事实”的力量则在于它发生了，虽然只有一例，却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某种病死亡率极高，可只要有一例生

存期超限，就会给其他病友带来极大的希望。

广东某三岁女童识字超过三千，一经媒体宣传，立刻使众多的年轻父母对生养一个神童充满信心。

建在福建农村的高速路尽管设有安全隔离网，却总有邻近的村民们不顾交通安全的宣传而在高速路上随意穿行或骑自行车，因为他们图方便已不只一次，他们的逻辑是，以往的事实已证明穿行高速路没有危险。总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于对偶发性事件作出进一步的推论，于是为无望带出希望，为危险带出侥幸，为特殊带出一般。

西方人重表达的精确性，而量化的数据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西方人多认为，无论是陈述事实还是表述观点，仅举一例是无以为据的，故在面对单一事例时，他们往往感到无法展开思维，他们会认为还缺乏足够的信息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有见到了“百分比”，他们才感到拥有了对全局的总体把握和全面了解。西方人比较注重事例的发生率，即所述事实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百分比低的事例则因带有偶然性而缺乏引证的力度。这就意味着，数据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所述事例的引用价值。所以，对西方人来说，数据比事例重要。

有一次，我与一位美国教师聊天，我不无自豪地谈到：“中国的学生就是聪明，你看，在美国的学校里，学习拔尖的总是中国学生。”老外没有直接表示不同意，只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到美国来上学的中国学生都是国内最好的学生。”

我当即就体味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我们只

看到了中国学生在美学习突出这一表面现象，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用自己最好的学生与人家的普通学生进行比较。这显然是一种不等价比较，因而不具有解释价值。在此，事例因具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意义。

对于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数据是空洞抽象的，并与个人毫无关系，只有看到了具体的事例，个人才感到拥有了比较的参照、评价的对象，仿效的榜样。所以，在中国人的眼中，事例比数据重要。“事例”的特点是富有感性化的感染力，“数据”则无疑是理性化思维的素材。中国人看问题是比较感性的，不像西方人那样理性化，所以中国人偏爱“事例”，而不像西方人那样热衷于运用“数据”。

无论是重“数据”还是重“事例”，都表达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仅从“数据”与“事例”的侧重性来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演绎法的特征，即从一般到特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带有归纳法的特征，即从特殊到一般。然而，无论我们怎样评价有差异的思维方式，有一点是必须意识到的，即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导致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解释问题的依据不同、理解问题的层面不同以及推理的逻辑程序不同。

用什么赌明天

从电视里看到了一组报道，内容是关于一些父母们如何为了培养孩子的一技之长，让孩子学钢琴。电视上展现的画面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这些大人和孩子们都破釜沉舟般地全力以赴，很多外地人为了孩子的琴业而全家常年驻守北京，住房和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不言自明的。最致命的是，不仅是大人辞了职，而且孩子也荒废了学业，最后的结果却是，孩子连年报考音乐附中或附小却屡屡失败，孩子的钢琴之路已明显是黯淡无光了，可回去继续上学又肯定已跟不上同龄孩子的功课，如此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付出太大，又断了其他所有的出路，家长和孩子便只好在明知道学琴之路前景不妙的情況下仍继续一条道走到黑。

这样的结局无疑已表明，只开辟一条生路是一种极不理智的选择，因为一旦此路不通时，孩子必将面临缺乏生存技能的危机，而这显然是与父母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重视培养一技之长的，作为一种生

存技能，一技之长显然是必需的。确切地说，一技之长是作为手段或工具以便使个体自立于社会的一种资本，这一点是大家容易达到共识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为孩子确定一技之长的方向并具体地加以培养则是一个歧义百生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一技之长”的本意是，在其他方面与一般人一样的情况下，又有某一方面很突出，而不是在什么都不如别人的条件下只拥有一种技能。让孩子放弃一切只追求“一技之长”，实际上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赌注则是孩子一生的前程，一旦赌输了，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像电视里介绍的这种赌博般的家长，在比例上看毕竟属于少数。前不久，我进行了一项关于北京市的儿童参加业余特长学习班的调查，发现 65% 的孩子业余时至少参加一项特长学习班，内容涉及器乐、绘画、英语、舞蹈、声乐、棋类以及各种体育项目。在这些致力于培养孩子特长的家长中，持有“定向培养，将来干这一行”态度的家长仅占 1.42%，以此作为开发智力的一种手段的家长占了最大比例（29.65%），其次是作为一种业余特长来培养（24.77%），还有 10.65% 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有这方面的爱好。

调查中发现，在众多特长培训项目中，学乐器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长都是付出最大的。特别是，爱学的孩子居少数，多数孩子都是按家长要求被迫学琴，于是，大人和孩子便陷入到相互对立、相互抗争的极大困苦之中。

本人曾采访过一些让不愿学琴的孩子继续学琴的家长，发现了造成学琴困境的一个来自思维方式的根源。实际上，只有少数家长是从一开始就立意让孩子将来当个音乐大师、走音乐之路，绝大多数家长只是抱着培养孩子的一种业余爱好、学习一点音乐常识的念头。然而一旦把琴学起来，往往是欲罢不能，致使物质和精神的投入都越来越大。其原因正如一位琴童的家长所言：“我知道孩子不爱学，但我不能让孩子建立想不学就可以不学的概念。”家长无疑是想让孩子从小懂得做任何事都要“持之以恒”而不是“半途而废”，但是，这种“持之以恒”是相当盲目的，以致付出了无谓的代价。

中国人是推崇“持之以恒”并贬斥“半途而废”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可以说，“持之以恒”作为世代相传的古训是每一代中国人向后辈传递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以往缓慢进展的传统社会中，持之以恒地学习和掌握一技之长就足以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当今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对于个体来说，不仅会面临原有的知识和技能不够用、需要增补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挑战，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原有的知识过时和原有的技能完全被淘汰、需要更换新职业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社会，一技之长显然是不够的，而限于人的时间精力，要想多“技”且都“长”又是不太现实的。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传统的思维方式，同时寻找适应现

代社会的高效生存方式。

目前从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恐怕对具备多重技能有着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即使是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知识老化和沦为新科盲的危机。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对我们的生存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灵活的转型能力，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够适应多种职业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和思维模式。从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那些能快速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适应新岗位的人是生存自如且大有发展前途的人。

要具备灵活的转型能力，相应的知识结构显然不是单打一式的“一技之长”，而是广泛领域的多方涉猎，而“持之以恒”的指导思想则必然要被“适可而止”的学习战略所取代。

考虑到社会现实，我们应当鼓励年轻的后辈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同时不反对他们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在此，当然不排除“半途而废”。其实半途而“止”并非意味着“废”，因为此时而废的半堵墙常常会成为彼时而立的整座楼的基础。

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中，总认为一项技能只有掌握到出类拔萃的程度才会于个人有利，其实，年少时涉猎的各种技能即使水平极有限，也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起到意想不到的正向作用。因此，年轻人的广泛涉猎，不必有太多的功利性考虑，凭自己的兴趣即可，也不必求甚解，更不必求出众。经历过的事作为一种经验，总会在日后或帮你度过难关，或帮你解脱困境，或帮你意外实现宿愿。